

多元族群下的地方主義： 沙巴客語影音創作的文化輸出

吳佳翰*

摘要

社群媒體和影音內容製作的普及讓少數語言的使用者得以跨越地理空間彼此串聯。馬來西亞聯邦的沙巴州是少數由客語作為華社通用語的第一級行政單位。當地華社的籍貫群其實非常多元，面對比華人多出 9 倍的原住民群體。本文欲補充過去研究從未探討的客語影音創作及背後的客原關係。沙巴的客語影音創作者首先結合國際流行文化和時事議題，讓沙巴成為馬來西亞客家文化的輸出地。創作者隨後進一步打造本地特色，融入原住民文化元素，製作「客原作品」。原住民對於沙巴客家仍是熟悉，甚至認為客家文化比其他籍貫群「有系統」。然而，「客原作品」卻存在局限，原住民的影音創作者並無融入客家文化元素的意識。沙巴原住民重視亞族的族群框架，有助於提升客家在原住民社群日常生活的能見度。其中，作為華人和原住民通婚後裔的 Sino，扮演了關鍵的轉譯者角色。

關鍵詞

婆羅洲、族群關係、馬來西亞、原住民、南島語族

* 獨立研究員

The Localism under Multi-ethnic Society: The Cultural Output of Sabah Hakka Online Content

Bernard Ng Jia Han*

Abstract

The high accessibility of online content via social media has connected linguistic minorities virtually that transcends the geographical barriers. Hakka, usually a secondary dialect among any regional Chinese community, is a lingua franca of the Chinese in Sabah, Malaysia. With a one-ninth population of Sabah natives, the Sabah Chinese society is predominately Hakka-speaking, but there are also other dialect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fills the research gaps in Sabah Hakka online content and the Hakka-Indigenous relationship. Incorpo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op culture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Hakka audiovisual creators first transformed Sabah into Malaysian Hakka's cultural output hub. The creators further localized their works by integrating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Sabah natives to produce "Hakka-Indigenous work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natives are familiar with Sabah Hakka and consider the Hakka more culturally systematic than other Chinese dialect groups. However, the "Hakka-Indigenous works" have limitations in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native creators have no preference for integrating Hakka culture into their works. In their daily life, Sabah natives accentuate a multi-ethnic framework, including sub-ethnic or dialect groups, which increases the visibility of Hakka. As a descendant of Chinese and native intermarriage, Sino plays a vital role as a cultural translator.

Keywords

Borneo, ethnic relations, Malaysia,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 Independent researcher

一、前言：多元族群下的客家人

馬來西亞的沙巴州是少數大中華地區以外，客家佔華人過半的一級行政區或州屬（劉瑞超 2017：2）。客語早在二戰前成了當地華社的通用語，但當地華人仍把客語看作附屬於華語的「方言」，稱之為「客家話」。值得注意的是，華人公民僅佔沙巴總人口的 7.2%（DOSM 2022: 45），客家人和其他族群之間的日常互動及認同形塑自然是無可迴避的議題。然而，這卻是沙巴客家研究所缺乏的面向（Liao Chih-I 2018: 54）。

沙巴總人口約 342 萬，有登記的非公民佔 23.7%，而原住民公民比例則高達 67.7%（DOSM 2022: 45）。在官方分類上，主要的原住民有佔 19.3% 的卡達山杜順人（Kadazandusun）、16.5% 的巴瑤人（Bajau）、9% 的馬來人¹（Malay）和 3.1% 的姆律人（Murut）（DOSM 2022:102）（2020 年沙巴族群比例，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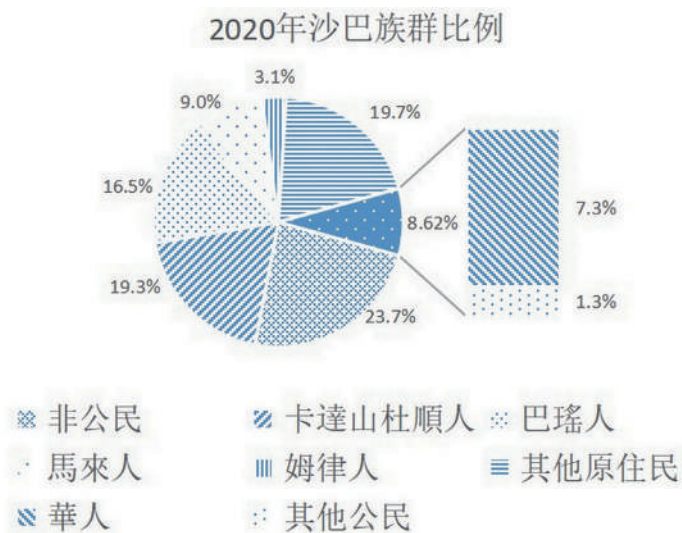


圖 1 2020 年沙巴族群比例（DOSM 2022）

本文嘗試從近年的沙巴客語影音創作觀察，補以筆者於 2016 至 2018 年的田野材料，探究沙巴客語的影音創作如何在複雜多元的族群社會成為客家文化的輸出地，筆者也會從輸出過程中的局限，探討沙巴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族群關係。所謂的客語影音創作，指的是以客語作為主要傳播語言的影視和聲音創作，其中包括音樂錄影帶（MV）、廣播內容、舞蹈音樂短片、重新配音他人影視作品等形式。2010 年以降，沙巴藝術創作者透過社群媒體平臺（臉書和 YouTube 為主），陸續發布了傳閱度高的影音作品，後期甚至納入原住民的文化元素，試圖打造本土特色。

¹ 多指沙巴的汶萊人（Brunai）、卡達央人（Kadayan），和來自西馬與砂拉越卻在沙巴定居的馬來人。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網絡觀察（2022）和田野調查（2016-2018）。前者主要是透過社群媒體和搜索引擎查詢沙巴客語的相關影音作品，從作品的互動數據²（engagement statistics）和再創作現象³進一步剖析讀者的回饋。後者主要是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透過參與觀察和訪談的方式，在沙巴西海岸收集資料。

二、沙巴族群關係概述

若按近代語言學分類，沙巴原住民（Sabah Native）可分成北婆羅洲語群（North Borneo languages group）、泛巴利多語群（Greater Barito languages group）、馬來語群（Malayic languages group）和泛中菲律賓語群（Greater Central Philippines languages group）（Smith 2017: 32, 442-443）。若對應官方分類，北婆羅洲語群涵蓋了卡達山杜順人、姆律人等，仍是最大的原住民語群。泛巴利多語群和馬來語群則分別對應巴瑤人和馬來人。至於人數最少的泛中菲律賓語群所指涉的是沿海地區的莫泊人（Molbog）、伊拉農人（Iranun）和蘇祿人（Suluk）。其中，和沙巴客家人互動且通婚最多的，當屬非穆斯林居多的北婆羅洲語群。

北婆羅洲語群過去被英國殖民者稱為杜順人、姆律人等。二戰後，居住在城區的天主教後裔主張「卡達山」的自稱，用來指涉當時杜順人的範疇，進而發起「卡達山民族主義」（Kadazan Nationalism）（Roff 1969: 329; Wong 2012: 114-115）。這群卡達山菁英後來帶領沙巴（時稱「北婆羅洲」）於1963年脫離英國殖民，與西馬、砂拉越和新加坡（1965年退出），共組馬來西亞聯邦。

多項研究指出，東南亞的客家人對於華人這社會範疇更有認同感，在客家人佔多數的沙巴也不例外（劉瑞超 2017: 193; Liao Chih-I 2018: 52）。沙巴的五大華人籍貫有客家、廣府、福建、潮州、海南（河合尚洋 2018: 267），外加其他少數籍貫和其他州屬所沒有的華北人（Teo 2014: 117），實屬馬來西亞華人籍貫最多元的州屬。就宗教而言，雖然沙巴客家基督徒常作為研究對象，但估計客家人和沙巴華人的基督宗教徒（含天主教）比例僅佔三分之一左右（河合尚洋 2018: 276; DOSM 2011: 92）。其實大部分沙巴華人和客家人都信奉民間信仰或是俗稱的「儒釋道」信仰，幾乎沒有穆斯林。

地廣人稀的沙巴，面積是兩個臺灣大，因此客家人未必是每個縣市的主要籍貫群。2000年代或更早以前，廣府話是山打根市華社的通用語，瓜拉班尤縣（Kuala

2 一般讀者可查閱的互動數據含觀看數、點贊數、留言數和留言內容。

3 影音作品的再創作含其他創作者針對原內容的反應影片（reaction video）、模仿、再演奏、詞曲改編等。

Penyu) 流行福建話(閩南語泉漳片)，而斗湖縣(Tawau)則曾是潮州話的天下。⁴ 其中，山打根和斗湖的中文譯名，也是根據廣府話和潮州話音譯「Sandakan」和「Tawau」而成。如今，當地年輕華人多是說華語、英語、客語或甚至說馬來語(沙巴縣市地圖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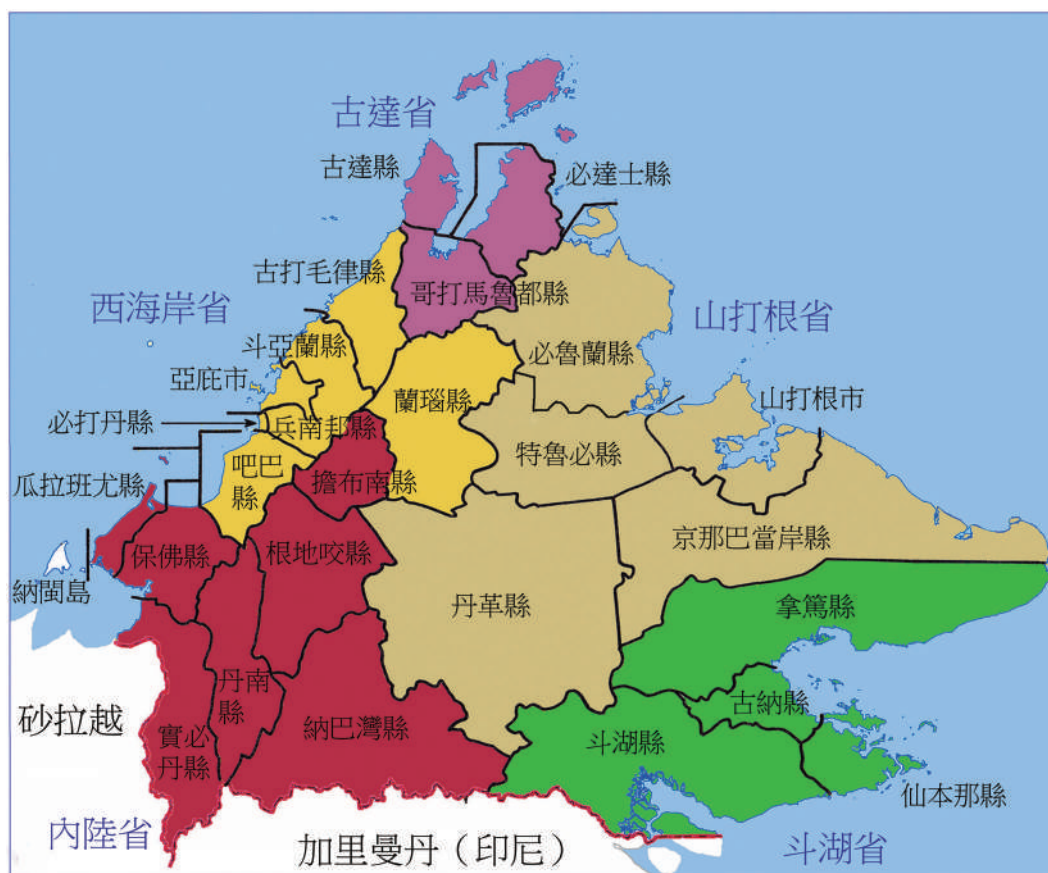


圖 2 2018 年的沙巴縣市劃分 (吳佳翰繪製)

鑑於英殖民者有組織性地讓客家人攜家帶眷移民沙巴，客家人二戰前的性別比例比非客家人低得多。以 1921 年為例，每 100 名客家女性可對比 196 名客家男性，其他四大籍貫的性別比則是 232 或以上 (Regis 1989: 444-445)。二戰後，各籍貫因找到合適的華人第二代，性別比在 1970 年回穩至 106 至 117 之間 (1921 年至 1970 年沙巴華人五大籍貫的性別比見表 1)。

4 斗湖的潮州公會成立於 1901 年，比當地客家公會早了 64 年。

表 1 1921 年至 1970 年沙巴華人五大籍貫的性別比

年份	數據	華人籍貫群					
		客家	廣府	福建	潮州	海南	其他
1921	總人數	18,153	12,268	4,022	2,480	1,294	1,039
	性別比	194	408	232	485	943	414
1931	總人數	27,424	12,831	4,634	2,511	1,589	1,067
	性別比	142	254	167	254	377	217
1941 年因二戰而無統計							
1951	總人數	44,505	11,833	7,336	3,948	3,571	3,181
	性別比	116	137	139	153	165	134
1960	總人數	57,338	15,251	11,924	5,991	5,270	8,768
	性別比	108	121	118	118	126	123
1970	總人數	79,574	20,723	17,418	7,687	6,419	7,688
	性別比	106	114	111	116	117	115

資料來源：Regis（1989: 444-445）

因為客家相對平衡的性別比，客家男性可以輕易地找到客家女性通婚，逐步擴大其人數優勢。殖民者配以土地等社會資源的移民配套，也讓客家移民多了先天的經濟條件，進一步在其他籍貫群面前形成族群優越感。同理，早期的客家人較少和原住民通婚（Mahibol 1994: 47）。其他籍貫的男性則單槍匹馬地來到沙巴經商或從農。他們或許在原鄉已經結婚，但為了拓展經商網絡和取得土地使用權，多會選擇與非穆斯林原住民婦女結婚（吳佳翰 2019：144）。英殖民者當時也鼓勵單身的華裔男性和原住民結婚，希望藉此讓他們定居，從而提高經濟生產力（Massey 2006: 208）。

二戰後，大部分發起卡達山民族主義的菁英具有華人血統，甚至華人姓氏（Sansalu 2008: 417; Wong 2012: 116）。英殖民者稱華人和原住民的通婚後裔為「Sino-Native」，後來逐漸演變成「Sino-Kadazan」、「Sino-Kadazandusun」等稱呼。無論哪個稱呼，Sino 一詞在沙巴常被用來簡稱這批混血後裔。具有原住民地位的 Sino 在 1991 年時增長至 22,245 人⁵（DOSM 1995: 89），但 Sino 在整體原住民的政經地位已大不如前。部分 Sino 也紛紛摒棄華人姓氏，藉此修改自己的法定族群，選擇成為卡達山或杜順人（Sansalu 2008: 407-408）。

根據筆者於沙巴西海岸所收集的 20 名 Sino 族譜，最早和原住民通婚的華裔男性有 4 成是福建人，客家人只有 15%，廣府和福州各一位，剩下的籍貫已無可追溯。

⁵ 之後沒有類似的統計。

因筆者的田野地點涵蓋福建人居多的瓜拉班尤縣和客家人居多的保佛縣（Beaufort）和亞庇市（Kota Kinabalu），這或許形成福建人偏高的數據，但足以呼應客家人早期較少和原住民通婚的事實。這時期的客原通婚現象也有城鄉差別。根據 Sino 報導人，二戰前的客原通婚現象在華人比例少的鄉區，比華人比例多的城區多很多（田野筆記 2017/08/15）。

在沙巴，家庭語言和籍貫認同未必掛鉤。2000 年後出生的客家人也逐漸不說客語，多數選擇使用華語或者英語成為首要的家庭溝通語言（Liao Chih-I 2018: 39-40; 劉瑞超 2017: 192）。廖致苙（2018: 52）提出不說客語也可以維持客家認同的可能性。劉瑞超（2017: 192）則提出「沙巴客語」和「沙巴客家」認同是兩個概念，因為很多自認不是客家人的華人使用客語，而他們也清楚知道自己不屬於客家這籍貫群。本文沿用「沙巴客語」來定義相關的影音作品，是因部分影音創作者並非客家人，且使用沙巴通用的客語腔調進行創作。

透過宗教組織和宗鄉會館近年所形成的跨國網絡，沙巴客家人試圖打造自己的在地特色（劉瑞超 2017: 194）。本文則從無國界的網際網絡著手，探討沙巴的影音創作者近年來如何結合客家認同和沙巴的地方認同，運用年輕人喜愛的流行元素，進而推廣作品理念。同時，沙巴客家人也逐漸放下過去的優越感，接納具有原住民（主要是北婆羅洲語群）文化元素的影音創作。然而，如此客家為主，原住民為輔的「客原作品」在原住民社群的傳閱度很低，筆者進而在第四節進一步分析沙巴原住民對族群框架和客家人的認知。

三、地方主義再現於網絡平臺

（一）國際影音作品的再創作

隨著社群媒體巨頭臉書於 2006 年開放給公眾使用以來，後繼的社群媒體應用程式已改變了全球讀者吸取資訊的方式。內容創作者（content creator）（或俗稱「網紅」）的竄起，改變了大家消費娛樂內容的模式。藝術創作者可以用更低的製作成本進行創作，觸及更廣更聚焦的受眾。馬來西亞人是社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每天花費 3 小時 2 分鐘於社群媒體，全球排名第 14（We are social 2022）。

沙巴雖是客家人的文化重鎮，卻不是早期馬來西亞客家流行文化的輸出地。取較為成熟的客家流行音樂為例，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馬來西亞著名的客家歌手邱清雲、謝玲玲和張少林皆是來自西馬的森美蘭州和雪蘭莪州。2010 年起，沙巴影

音創作者逐漸透過臉書和 YouTube 輸出客家文化，藉此引起新馬甚至中港臺客家人的注意。以下所提及的影音作品皆是擁有上百萬觀看數的作品，如此高廣傳率的現象方值得深入討論。擁有 16,000 名成員的臉書社團「好客棧出來！臺灣客話行動聯盟」是由臺灣年輕客家倡導者所管理。其中一位創辦人曾向筆者表示，自身是透過「老楊」影音創作系列而認識沙巴客家（老楊系列其中一幕見圖 3）。



圖 3 「老楊」系列的其中一幕講述老楊宣稱要當政府（截屏自 pingts 的 YouTube 頻道）

「老楊」系列是影視作品的再創作，分別改編自香港電影《葉問》、《葉問 2》和《赤壁》，於 2010 年 10 月發佈於 YouTube。影片截取電影的片段，以客語配音，影射當時的馬來西亞政局，為影片的主角「老楊」拉票。「老楊」所暗指的是，經常使用客語公開演說的沙巴進步黨黨主席楊德利。沙巴進步黨原屬於時任的聯邦和州執政聯盟國陣（Barisan Nasional），在 2008 年大選國陣失守三分之二國會議席後，以國陣長期邊緣化沙巴為由，而選擇退出國陣。「老楊」系列的製作團隊因認同楊德利的地方主義（localism），而選擇在他競選三腳石（Batu Sapi）國會補選期間，製作客語影片來為他拉票。楊德利和製作團隊的地方主義，展現在「老楊」系列最後一幕的一段（見圖 4）（無著作人 2013）：

沒有自主權，就沒有沙巴。

勇敢擺脫成為聯邦奴隸，踴躍投票消滅幽靈選民；

支持本土當家還原自主，擊退外敵維護家園沙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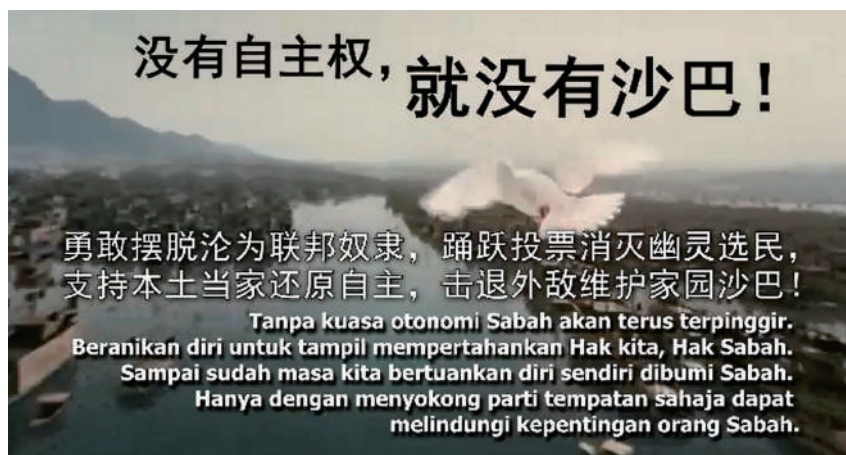


圖4 「老楊」系列最後的影片《2013 沙巴命運之戰》的最後一幕（截屏自 ini kalilah 的 YouTube 頻道）

楊德利認為，國陣的衰弱是「機會之窗」，有助於沙巴索回原本在《1963 年馬來西亞協定》裡的自主權（autonomy）（楊德利 2012）。沙巴自主權成了沙巴進步黨退出國陣後的主旋律，是保護地方權益不受中央或聯邦政府侵蝕的地方主義。國陣最大政黨巫統在 1994 年執政沙巴後，一改過去由沙巴本土政黨所執政的局面，沙巴政府的決策也多是以聯邦政府的利益為先。沙巴進步黨認為，濫用馬來西亞身分證而造成的幽靈選民現象，是國陣增加自身選票的伎倆（楊德利 2011）。因此，沙巴急需回到由本土政黨執政的局面，以免進一步喪失自身的權利。搭配中文流行文化和馬來西亞華人高亢的政治熱情，「老楊」系列精準諷刺時下政局，引起廣大共鳴，讓非客家人認識到沙巴客語的「品牌」。然而，網上受歡迎的程度並沒有轉換成選票，沙巴進步黨在之後的國會及州議會選舉中皆全軍覆沒。

除了評論時政，沙巴的獨立創作者也結合韓美流行文化，推廣客語的能見度。如此再創作傳閱度高的社群內容，是內容創作者吸引流量的常見手段。沙巴獨立舞蹈團體 OSS 和音樂創作者余焄龍，相繼把南韓流行歌曲《江南 style》（2012）改編成客家版《Orang Sabah Style》（馬來文：沙巴人風格）和《沙巴客家 Sytle》。兩首改編的歌詞多描述沙巴的風土人情。除了以上兩首，第三版《亞庇客家 sytle》則是來自舞蹈團體 Synergy Dance Studio。該舞團也把美國熱曲《Sexy and I know it》改編成客語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創作已經直接在作品名稱鏈接客家和沙巴地名，如「沙巴客家」和「亞庇客家」，呈現客家認同和地方認同重疊的屬地主義。這時期沙巴的客語歌曲開始走出國際，余焄龍更是憑著首張客語專輯的主打歌《海邊看飛

機》，獲得由於中國大陸廣東省舉辦的 2010 年客家流行音樂金曲榜的十大金曲獎。後期，網路出現更多的創作者，如曾在臺灣留學的廣播人「皮特好」，製作客語的彈唱內容。

馬來西亞 1980 至 1990 年代的客語創作受到香港藝人許冠傑等的影響，描述小百姓的心聲，並無屬地主義或評論時政等大議題的作品。沙巴的客語創作則改變了馬來西亞主流的客語創作，配以流行和幽默的當代元素。這些創作者不僅把沙巴的在地認同與客語結合，同時也嘗試改變客語一般被認為粗俗和落伍的形象（Liao Chih-I 2018: 41）。沙巴客語創作的關懷面向擴至全國議題，甚至結合國際流行音樂和電影，引起高度傳閱。社群媒體平臺和影音內容製作成本的降低，讓沙巴的藝術創作者無需像過往飛至吉隆坡，在當地公司的幫助下完成作品的製作和發布。全國性的製作公司需考量市場需求，往往不會接受以沙巴本土為主題的創作。沙巴客語剛開始的創作雖和 8、90 年代一樣，受到外地流行風潮的影響，但後來發展出在地特色。鑑於沙巴客家的屬地主義，創作者自然而然也會關注當地原住民的文化，為此嘗試開創了「客原作品」的在地化趨勢。

（二）融入原住民元素的本土創作

「客原作品」仍使用客語作為主要創作語言，但是所描述的內容與原住民（北婆羅洲語群為主）相關，必要時也會融入少數原住民語言，甚至融入原住民舞蹈、樂器和曲風。因為客語仍是這些影音作品的主要語言媒介，筆者將類似的作品稱為「客原作品」，而非「原客作品」。這些作品經常融合華人和原住民的曲風，或是穿插客語及原住民語歌詞，企圖融合兩者的文化元素。

北婆羅洲語群的語言傳承展現在其音樂產業，此音樂類型在沙巴稱為 Rentak Sumazau（「蘇馬紹舞」節奏）或 KDM（Kadazan Dusun Murut）流行音樂。Rentak Sumazau 源自 1950 年代的沙巴曲風，結合了北婆羅洲語群的傳統樂器（各種大小的銅製敲擊鑼、竹製吹奏樂器等）和西洋民歌曲風，漸漸發展成了節奏輕快的流行音樂。

北婆羅洲語群擁有本身的唱片工業與市場，在慶祝豐收節（Tadau Kaamatan）期間，會推出卡達山杜順語和姆律語的專輯或單曲。如此的做法和新馬華人每年會在農曆新年間，推出「賀歲專輯」的習俗相近。豐收節原是卡達山人祭拜稻米女神的田祭，後在卡達山民族主義運動下，變成沙巴每年最大的節慶活動。豐收節的主辦方也會在各縣市舉行母語歌唱初賽，進而遴選州級各個年齡層的決賽選手。馬來

西亞政府於 2022 年立下里程碑，授權一機構為州內音樂家和藝術家徵收與分配版權稅（詩華日報 2022），足以見證此產業的壯大。

相對於北婆羅洲語群的音樂產業，沙巴客家流行音樂仍未成型。雖然客家人和北婆羅洲語群之間的通婚逐漸普遍，但兩者的藝術創作此前很少交集。其中一個重要的突破是歌手余焜龍於 2015 年推出的客語歌曲《I Love Sino-Kadazan》（見圖 5）。該曲描述了華裔男生對 Sino 女生的愛慕，也反映了當代不少客家男生與 Sino 女生共譜戀曲的現象。歌手特地選用客語這沙巴華社通用語，而非一般華語作為演唱語言，凸顯了客語與沙巴的特殊性與關聯性。客語歌詞加入了少數卡達山語和英語，編曲也融入了 Rentak Sumazau 的元素。這首歌成功地把 Sino 和客家這兩個代表沙巴的文化象徵結合。

我鍾意 Sino-Kadazan，絕對是 local 的 product，
獨一無二地自從，從前從前，有這麼漂亮的配合，
給 Sabahan 一個讚……。



圖 5 余焜龍所唱作的《I Love Sino Kadazan》（截屏自 Tianlong 的 YouTube 頻道）

這一段歌詞更是將 Sino 形容成沙巴特殊的「產品」，表明在馬來西亞其他州屬並沒有類似的擁有原住民地位的混血族群，暗指沙巴的族群和睦與融合。歌詞更將 Sino 族群的生成時間點從 19 世紀末提前至「從前從前」。如此「歷史悠久」且

特殊的族群，加上沙巴客語，建構了「沙巴漢」（沙巴居民）特殊的地方認同。作為客原作品的「始祖」，此曲首先選擇了沙巴華人比較熟悉的 Sino 作為切入點，而非直接取材華人比較不熟悉且難接受的其他原住民群體。如此的策略讓本身是華人和原住民「融合體」的 Sino 本身，也充分發揮了「客」和「原」之間文化橋樑的角色。這首歌曲不僅在沙巴華人圈子受歡迎，也在 Sino 社群受到認可。筆者曾在 2018 年參與負責維護 Sino 權益的 Sino 公會晚宴上，聽到主辦方邀請其他樂團演唱這首客家歌曲（圖 6）。現場其實也有其他聽不懂客語的 Sino 成員，如此的安排無疑讓 Sino 或其他原住民更有機會接觸沙巴的客語歌曲。



圖 6 Sino 公會於 2018 年為了慶祝 Sino Day 而辦的文娛晚會（吳佳翰攝影）

《I Love Sino-Kadazan》的成功也激發了更多創作者的仿效。其中有兩首客語歌曲是豐收節的「賀歲歌曲」，同時進一步取材整體的原住民群體，而非文化橋樑 Sino。第一首是廣播人皮特好等人所演繹的《Kihoi！等你轉來》，歌曲 MV 同樣展示沙巴鄉區風景搭配北婆羅洲語群的視覺元素（舞蹈、服飾、食物、米酒等）。歌詞描述的是豐收節期間華人和原住民之間的一見鍾情，但是原住民的身分並非只鎖定在 Sino 身上。第二首則是中年男士樂團所創作的《齊慶祝·豐收節》。全客語的歌詞則是描述華人參加豐收節的方式，如尋找原住民的節日美食（燒豬燒羊）、觀看選美比賽（Unduk Ngadau）、出席歌唱比賽（Sugandoi）等。該樂團「四千斤 Borneoholic」的取名除了凸顯婆羅洲的地域性，也邀請了 Sino 網紅陳雪仁（Sheron Tan）一同獻唱。

陳雪仁的父親是來自西馬的潮州人，母親是北婆羅洲語群的龍骨斯人（Run-gus）。她是在 IG 擁有 12 萬粉絲數的影音創作者，經常演唱華語、馬來語、英語和母親所寫的杜順歌曲。以 Sino 和沙巴為座標的她，曾在 2017 年向筆者坦言，相較於父親的潮州話，她更想演繹客語歌曲；但礙於自己不會說客語，以致一直沒有創作客語相關的影片。《齊慶祝·豐收節》是她的第一次，透過四千斤樂團的客語語言能力，讓她成為首個演繹客家歌曲的 Sino 創作者。在這三首歌曲裡，Sino 在其中兩首作為被歌頌和歌頌者的對象，進一步印證了 Sino 作為客原作品關鍵橋樑的角色。

然而，上述客原作品在 YouTube 的觀看數不及 50 萬，在臉書的分享數則少過三千，傳播力遠不及上一小節所提的影音作品。若進一步觀察，這些客原作品的留言者幾乎都是華人或是 Sino，代表作品並沒有在原住民社群內傳開。探究其因，如此的局限或許可以從原住民的觀點理解。

（三）客原創作的局限

以上客原元素融入創作的現象僅局限於華人或 Sino，幾乎沒有出現在北婆羅洲語群藝術創作者的影音作品裡。換句話說，這些影音作品在內容取材上，並沒有談論與華人或客家人通婚的現象，也沒有涉及沙巴客家的相關文化。在曲風、歌詞和視覺表徵，這些原住民語為主的影音創作也沒有融入華人曲風、客語及舞蹈。

北婆羅洲語群創作者並非沒有融入其他的文化元素，如其他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文化元素。1980 年代出道的著名杜順歌手 Francis Landong 曾創作一首融合砂拉越達雅人音樂的歌曲《Tupus Pokitanan》（杜順語：蝴蝶的愛情）。他在間奏結合了沙巴常見的 Kulintangan 樂器及砂拉越常見的沙貝（Sape）樂器。聽眾針對如此婆羅洲音樂的融合於留言區一致給予好評。如此忽略於同一片土地生活的客家文化，又融入其他婆羅洲原住民文化的現象，可能預示了沙巴原住民始終認為自己在文化上更加接近後者。

事實上，和同在婆羅洲的印尼山口洋市（Singkawang）相比，沙巴作品融合的程度仍低。西加里曼丹（簡稱「西加」）山口洋的族群融合現象體現在當地客家人對達雅人（Dayak）的描述，尤其是工作態度（達雅人比馬來人勤勞）、生活飲食習慣（同樣吃豬肉和養狗）和宗教信仰（皆有民間信仰）的面向（蔡芬芳 2016：41）。筆者認為，西加客家人比沙巴客家人更能融入婆羅洲原住民的關鍵在於，前者和原住民通婚的時間點（18 世紀）（蔡芬芳 2016：41），比後者（19 世紀末）足足早了一百多年。

透過《Anak Kampung》（馬來語「鄉下仔」）這首杜順歌的傳播與翻唱，既能凸顯以上論點。《Anak Kampung》原是一首發表於 2010 年的杜順歌《Tanak Kampung》，後由原唱 Jimmy Palikat 翻唱成馬來語。歌詞講述一名來自鄉下的男生，因為出身卑微而不敢追求所喜愛的女生。平易近人的歌詞，加上旋律輕鬆的 Rentak Sumazau 曲風，歌曲推出後立即在沙巴引起關注，之後傳遍新馬印的馬來樂壇。

歌曲經歷幾度翻唱，一名暱稱 Holland Ariyanto 的山口洋客家人於 2018 年將之改編成客家版（見圖 7）。歌詞從情歌改成山口洋鄉下的客家人去雅加達大城市吃苦掙錢的小市民心聲。其中一句「求天求地拜伯公，希望有日會成功」把客家伯公信仰納入，算是很成功的翻唱。西加和沙巴同是客家人和婆羅洲原住民居多的區域，在流行文化的融合上卻有一定的落差。終歸究底，沙巴客語創作者鮮少關注北婆羅洲語群的創作，反之亦然。至今，僅有 Sino 陳雪仁將《Anak Kampung》改成華語版，客家版仍缺席。



圖 7 Holland Ariyanto 所改編的《Anak Kampung》（客家版）（截屏自 Holland Ariyanto 的臉書）

影音作品是創作人有意圖地展現，這不同於日常生活中自然生成的文化交流，如常見的飲食文化。雖然沙巴原住民幾乎沒有特地融入客家元素的影音作品，但不能說客原之間沒有交流，語言融合便是其中之一。沙巴馬來語（Sabah Malay）是自前殖民時期的各個母語使用者溝通時首選的自然語言，演變至今已自成一格。類比中文學術界比較熟悉的峇峇馬來（Baba Malay），沙巴馬來語也是馬來語在馬來群島各地因通商而克里歐化（creolized）的變體之一。

沙巴馬來語融合了北婆羅洲語群、汶萊馬來語（Bahasa Melayu Brunei）、客語等詞彙。常見的客家語彙有 Ngam（對、合適）、Ngam-Ngam（恰好、剛好足夠）、Cincai（隨便、無條理）、Ping（冰）等。Ngam 和 Ngam-Ngam 對應客語的「啲」和「啲啲」（無著作人 2019），用法和客語完全吻合。Ping 則常見在點飲料時，如加冰的茶或咖啡（Teh Ping 或 Kopi Ping）。這些語彙雖然也常見於其他籍貫語，但基於沙巴客家人居多的事實，這些詞彙應受客語影響。

和山口洋的狀況相比，沙巴的影音創作融入客原元素的程度並不高，但相較於過去，已取得進展。北婆羅洲語群不會在影音創作上凸顯客家文化，是因他們歌曲的辨識程度已很高，同時認為自身的語言文化已足以代表沙巴認同。沙巴馬來語則是以馬來語作為主幹，裡頭的客家語彙僅是眾多本地語言常見語彙的一部分，並非只是單單由北婆羅洲語群和客語兩者所組成，嚴格來說稱不上是「融合」。然而，客家人在沙巴原住民眼中是熟悉的，而根據他們對族群框架的理解，客家人並不會統合且簡化成「華人」的認同底下。

四、北婆羅洲語群對於客家人和族群框架的理解

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大民族，是大部分馬來西亞人對族群分類的認知。如此三大民族的認知也延伸至沙巴，聯邦政府和主流媒體也常把沙巴的族群，分類成穆斯林原住民、非穆斯林原住民和華人。然而，沙巴北婆羅洲語群對於族群的框架並非三大民族，也不像砂拉越非穆斯林原住民般，逐漸將自己歸統於「達雅人」的認同底下。

過去，北婆羅洲語群（姆律人除外）經歷卡達山民族主義和 1980 年代的卡達山杜順民族主義（Kadazandusun Nationalism），嘗試建立卡達山人或卡達山杜順人的共同認同。1990 年代末，也有的政黨欲創造涵蓋更多人口的「卡達山杜順姆律人」（Kadazandusun Murut，簡稱 KDM）之認同，最終未能成功。新創族群的名字不斷加長，更是預示了統合北婆羅洲語群認同的努力遇到了瓶頸。

20 世紀初，中華民族主義下所塑造的「華人」和「方言群」的概念影響了卡達山民族主義。跨越華人和卡達山人文化的 Sino 把「華人和方言群」的框架轉譯給卡達山民族主義者。也是 Sino 的卡達山地方領袖 Fedlis Tan Hing Ping 是重要的轉譯者，他主張 Sino 是卡達山人底下的方言群。他因此把卡達山人類比華人，並強調：「沒有杜順，我們都是卡達山人……正如華人有海南人、客家人、福建人、

潮州人。卡達山人也一樣，我們也有像 Tagaas, Tanggah, Lotud 等分支，但我們都是卡達山人」（Stephen 1960）。文中的 Tagaas、Tanggah、Lotud 等是來自不同地區的北婆羅洲語群自稱，過去被殖民者歸納在杜順人底下。這些社群擁有自身的習俗法、腔調和祖源地，後來被馬來西亞官方定義成卡達山人或卡達山杜順人的亞族（sub-ethnic）。同理，客家人、福建人等籍貫群，也同樣被定義成華人的亞族（DOSM 2011）。

為此，卡達山民族主義者在形容卡達山人和其底下亞族的關係時，極有可能借用華人和籍貫群的概念。北婆羅洲語群底下的亞族，存在口音和腔調上的差異，祖源地接近的能互通彼此，祖源地稍遠的則無法溝通。如此因口音和腔調差異而區分的亞族，似乎不能完全類同於華人的籍貫群，因為籍貫群內部也有腔調區別。因此，卡達山民族主義者的類比還需要更細緻的印證與討論。但無可否認的是，類似的族群框架已透過官方分類深入民心，筆者在田野期間所遇見的北婆羅洲語群，的確能清楚理解華人和籍貫群的關係，區辯客家人、福建人等至少三個華人籍貫群。

縱觀這些籍貫群，客家人被北婆羅洲語群視為最有文化體系。娶了西馬華人的北婆羅洲語群 Jeff 便是其中一位。Jeff 並非專家學者，不曾在沙巴以外的地區長居，卻對沙巴的歷史文化非常感興趣。筆者曾在 2018 年 2 月 11 日和 Jeff 聊起這話題，他認為：

因為像是峇峇娘惹從中國來時，是一組人來，是精英分子，是過去中國帝王制度的菁英。就像過去蘇丹，非常有條理，有自己的系統，這和常民百姓不一樣。只有一些人有服裝穿，但是百分之九十是沒有衣服的。當沒有衣服的人來時，是沒有文化的……在英殖民時期，前來沙巴的華人，只是平民。貴族只有部分，剩下的是逃離家園的。他們有企業家的精神，想要重新開始生活，來到這裡。只有部分是有系統的（organized），像是客家，客家有自己的一套食物系統、家屋系統。

報導人 Jeff 首先認為，文化必須是「高級」的，而在中國帝王時代的貧困人士是「沒有文化」的。接著，當單槍匹馬的平民移居海外後，無法將原鄉文化「有系統地」帶來；唯有群體移居才能有系統地維持。Jeff 了解沙巴客家人是攜家帶眷地移民，而其他籍貫群則是孤軍奮戰地適應沙巴的生活，因此認為沙巴客家人的文化比較有系統。其他原住民或許和 Jeff 一樣，無法辨認客家和其他籍貫群的文化差異，僅能憑著日常相處或博物館所展示的客家文化，進而認為沙巴客家文化是「比較有系統」。

如此憑著生活空間的記憶，的確讓客家在原住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實上，很多非客裔後代的 Sino 報導人，已不會說華語或是自己的籍貫母語。但是他們卻透過與華人的生活互動，掌握基本的客語。1927 年出生的報導人 Tay Kon Moi bin Tay Ah See⁶便是其中之一。Tay Kon Moi 的父親 Tay Ah See 來自中國福建漳泉一帶，後來在沙巴和杜順人結婚。屬於福建移民第二代的 Tay Kon Moi 則和同是 Sino 的 Liew Nyat Tau@Nova Lloyd⁷結婚。筆者和 Tay Kon Moi 溝通時（見圖 8），發現他連簡單的福建單詞都聽不明白，卻能說出幾個客家單詞。由此推測，Sino 等原住民對於客家的熟悉並非來自私領域，而是客語在沙巴公領域的普遍性。



圖 8 報導人 Tay Kon Moi bin Tay Ah See 拿著自己年輕時的照片（吳佳翰攝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

「卡達山杜順姆律人」的認同打造受挫後，沙巴原住民正往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方向發展（吳佳翰 2020：122）。首先，原是杜順底下的龍骨斯人成功升級成為主族群，後有塔達那人（Tatana）也於 2014 年成功「獨立」。如此碎片化

⁶ Tay Kon Moi 是 Tay Ah See 兒子的意思。A bin B 是阿拉伯的取名方式，代表「A 是 B 的兒子」。然而，Tay Kon Moi 和父親並非穆斯林，如此的取名應該是 1960 年代末受到時任沙巴州政府所推行的伊斯蘭化政策有關。

⁷ 即有兩個名稱 Liew Nyat Tau 和 Nova Lloyd，Liew Nyat Tau 因小時被洋人領養，而有了 Nova Lloyd 這名字。

的現象不僅出現於北婆羅洲語群，也出現在其他語群。若對比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統計列表，名單多了汶萊人（Brunai，馬來語群）、布隆岸人（Bulongan，馬來語群）和莫泊人（泛中菲律賓語群）（DOSM 2001: 104; DOSM 2011: 129）。這些亞族「成功升格」成為主族群的案例讓其他亞族欲欲一試，如沙巴文化局在 2014 年至 2016 年展開「沙巴身分認同與人群劃分」工作坊，與會的各族群及亞族群代表經商討後，同意 7 個亞族擁有成為主族群的資格及條件（田野筆記 2018/11/12）。雖然州政府仍擱置著此項建議，但足以證明亞族在沙巴原住民認知裡的重要性。

沙巴原住民的碎片化趨向和西馬馬來人或砂拉越原住民統合的方向相反。如此族群框架認知的改變，能進一步提升客家和其他籍貫群在沙巴的能見度。相反，如今的西馬馬來人則是不願提及自身的亞族，如 1947 年人口普查所列下的 Malays Proper⁸、Sundanese、Javanese、Boyanese、Achinese、Menangkabau、Korinchi、Jambi、Palembangan、Riau Lingga Malays、Banjarese、Bugis 等（Hirschman 1987: 577）。1957 年和之後的人口普查再也沒有詳列馬來人底下的亞族，馬來民族主義者藉此企圖打造強大且團結的馬來認同。西馬的華人在如此的壓力下，會趨向華人作為標榜自己認同的更大公約數，壓抑籍貫的特殊性與能見度。

筆者通常詢問西馬馬來人「Melayu apa？」（馬來人的什麼亞族？）時，得到的回應一般是：「Melayu Melayu lah！」（馬來的馬來人咯！）對方通常用語氣把話題聊死，讓人無法繼續追問。若聊及西馬的原住民（Orang Asal），大部分馬來人的回饋是原住民底下的亞族分類並不重要。對來他們來說，華人底下的籍貫群也不重要，因為終究的差異還是在馬來人和華人的族群邊界。唯一的例外是一名移居至沙巴的西馬馬來人。和卡達山女子結婚的他，原本第一個反應是不肯承認馬來人有亞族，反問為什麼沙巴人都是這樣問他。後來，他又鬆口說自己是南婆羅洲 Banjarese 的後裔。他原有的三大民族框架，應該在妻子和沙巴人的影響下開始鬆動，承認各個族群都有「亞族」。

沙巴原住民普遍上對客語及客家人有著基礎認知，除了因為客家人和客語在沙巴公領域的能見度，也和沙巴原住民著重主族群及亞族的族群認知框架有關。在族群認同碎片化的趨勢下，沙巴原住民亞族的能見度得以提升，華人籍貫群的分類更在 Sino 早期的轉譯下，成為原住民間理解彼此的方式。如此重視亞族的族群框架極有可能在未來影響沙巴華社，在地方主義的驅使下，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客原作品的出現。

⁸ 馬來文稱作 Anak Jati，是前殖民時期馬來半島馬來蘇丹王朝公民的後裔。

五、總結

除了教會（巴色會）和宗鄉會館所建構的跨國網絡，社群媒體和影音製作的普及讓沙巴客語在 2010 年後走出了沙巴，成為馬來西亞客家文化的輸出地，甚至傳播到兩岸三地。沙巴影音內容的創作者擺脫過去單純描繪市井心聲的客語作品，反而結合時事政局和國際流行文化，運用客語再創造。這時的創作基於沙巴社會的地方主義氛圍，同時直接把「沙巴」或首府「亞庇」和「客家」結合。如此的作品能更加貼近年輕世代，更能扭轉客語被視為粗魯或落伍的印象。

融入原住民元素的客語創作始於 2015 年之後，地方認同讓北婆羅洲語群的文化與沙巴客語結合，讓沙巴客語的創作有了自己的特色，不只是受到外地流行文化的影響。然而，類似的趨勢僅在華人創作者的作品中看見，傳播率也不及單純的客語創作。客原作品的局限，也體現在《Anak Kampung》這首杜順曲風歌曲的翻唱與傳播。該歌曲雖然源自沙巴，但其客語版本卻是 8 年後由山口洋的創作者改編，可見沙巴客原影音創作者之間的交集不大。沙巴和山口洋皆是婆羅洲原住民和客家人居多的區域，但山口洋客原作品的融合程度遠比沙巴高。

2000 年之後，沙巴原住民皆呈現亞族獨立成為主族群的趨勢。過去團結北婆羅洲語群在一個大帳篷底下的努力也面對挫折。這不同於團結砂拉越非穆斯林原住民的達雅認同，也異於逐漸淡化亞族的西馬馬來人。沙巴原住民因此欲強調「三大民族」以外的框架，也讓北婆羅洲語群順道重視華人底下的亞族，尤其是客家人。

沙巴原住民的族群框架有助於提升客家人的能見度。北婆羅洲語群能清楚識別沙巴客家，甚至認為客家文化比其他籍貫群「有系統」。基於沙巴客家人在商業和宗教的主導地位，北婆羅洲語群能透過公領域的客語語境，而熟悉部分客家語彙。在以上客觀條件的綜合下，客原影音作品如今有了雛形，其發展趨勢值得進一步觀察。

參考文獻

專書

- 蔡芬芳，2016，《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臺北：遠流。
- DOSM, 1995.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1991. State Population Report: Sabah.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DOSM, 2001.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00.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DOSM, 2011.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010.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DOSM, 2022.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2020.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Mahibol, Jenith. 1994, *Satu Kajian Kes Identity Etnik Sino-Kadazan di Pekan Papar* (A case study of Sino-Kadazan ethnic identity in Papar town). Bachelor thesis, Dep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alaya.
- Massey, Andrew,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gnation: British North Borneo under The Chartered Company, 1881-1946*. Kota Kinabalu: Sabah State Archives.
- Sansalu, Dayu, 2008, *Kadazandusun di Sabah: Pendidikan and Proses Pemodenan 1881-1967* (Kadazandusun in Sabah: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1881-1967).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Smith, Alexander D. 2017. *The Languages of Borneo: A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Ph.D. diss., Dep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專書論文

- Regis, Patricia, 1989. "Demography." Pp. 405-448 in *Sabah 25 years later, 1963-1988*. Johannes G. Kitingan and Maximus J. Ongkili, Kota Kinabalu: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Sabah).
- Stephen, Donald, 1960, "DUSUN or KADAZAN?" *The North Borneo News & Sabah Times*, June 30.

期刊論文

- 吳佳翰，2020，〈核心與邊緣—馬來西亞沙巴原民性的形塑〉。《歷史人類學學刊》18 (2)：97-139。

- 河合尚洋，2018，〈馬來西亞沙巴州的客家人——關於移民、認同感、文化標誌的多點考察〉。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7：265-280。
- Hirschman, Charles, 1987,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3): 555-582.
- Liao Chih-I. 2018, “Can a Person be Hakka without Speaking Hakka? The Conflict between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 Hakka Community in Sabah.” *Global Hakka Studies* 10: 27-58.
- Roff, Margaret. 1969,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2): 326-343.
- Teo, Bernadette Siau Jin. 2014, “Family, Marriage, and Kinship: The Northern Chinese of Sabah Revisited.” *Asian Culture* 38: 117-136.
- Wong, Danny Tze Ken. 2012, “A Hybrid Community in East Malaysia: The Sino-Kadazans of Sabah and their Search for Identity.” *Archipel* 84: 107-127.

碩博士論文

- 吳佳翰，2019，〈成為沙巴「原住民」——馬來西亞 Sino 的生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 劉瑞超，2017，〈「客家」過程：在地與跨國視野下的沙巴〉。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影視資料

- 無著作人，2013，〈2013 沙巴命運之戰 part 4〉。《YouTube》，4月15日。
https://youtu.be/xx0rWiPg_C8，取用日期：2022年3月29日。

網路資料

- 無著作人，2019，〈客家正字轉載〉。《客家風情》，4月10日。<http://www.hakkaonline.com/thread-136822-1-1.html>，取用日期：2022年3月29日。
- 楊德利，2011，〈楊德利評幽靈選民問題〉。《沙巴進步黨》，8月2日。https://sappcn.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9359.html，取用日期：2022年3月29日。
- 楊德利，2012，〈楊德利：敦馬言論證明沙民無須看聯邦臉色〉。《沙巴進步黨》，5月6日。https://sappcn.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06.html，取用日期：2022年3月29日。
- 詩華日報，2022，〈貿消部：沙音樂版權公司為許可機構 進行徵收版權稅〉。《詩話日報》，1月17日。<https://news.seehua.com/?p=792923>，取用日期：2022年3月29日。

Anonymous. 2018, “Apa beza Loghat Pulau Pinang, Kedah & Perli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lang of Pulau Pinang, Kedah and Perlis?)” In *Apabezanya*. <https://apabezanya.blogspot.com/2018/11/apa-beza-loghat-pulau-pinang-kedah.html> (Date visited: 29 March, 2022)

The Borneo Post. 2011, “Nov 11 is Sino Day.” In *The Borneo Post*, 10 October.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11/10/01/nov-11-is-sino-day/> (Date visited: 29 March 2022).

We Are Social. 2022, “Digital 2022: Global Overview Report.” In *We Are Social*. <https://wearesocial.com/sg/blog/2022/02/digital-2022/> (Date visited: 17 July 2022).